

童中心 著

失衡的帝国

SHIHENGDEDI GUOSHIHENGDEDEDIGUO

——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

贵州人民出版社

失衡的帝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衡的帝国：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 / 董中心
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10
ISBN 7-221-05587-4

I. 失… II. 董… III. 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200 号

失衡的帝国——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

著 者	董 中心
责任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谢啸冰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275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5
印 数	2000

ISBN 7-221-05587-4/K · 592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AA 34/10

问 题

我们的问题,是由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地理生存条件而引起,因此在展开对问题的讨论之前,让我们通过《中国地理形势图》初步了解一下中国的地理面貌。

中国的地理面貌,一定会使你非常吃惊,也一定会引起你对中国的很多疑问。

这是一片多么艰难的土地啊!

庞大的中华帝国何以能在这片几乎全是山脉的土地上绵延了数千年?

这片只有几块小小平原的土地怎么能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

中国人是用什么魔法来解决生存问题的呢?

中国历史还能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多久,还能延续五千年吗?

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不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了,他们将会怎么办?

如果这种情况在某一天真的发生了,中国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它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文明会像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那样衰亡吗?

当代中国人能够仅仅凭借他们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去实现他们在世界的雄心吗?

……?

这一系列从远古到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返回到历史中去冷

静地思考：

决定中国历史与前途的因素是什么？

中国文明有什么独特的性质？

中国历史是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的？

为什么在这样艰难的地理环境中它的历史会如此久远？

造成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社会动荡的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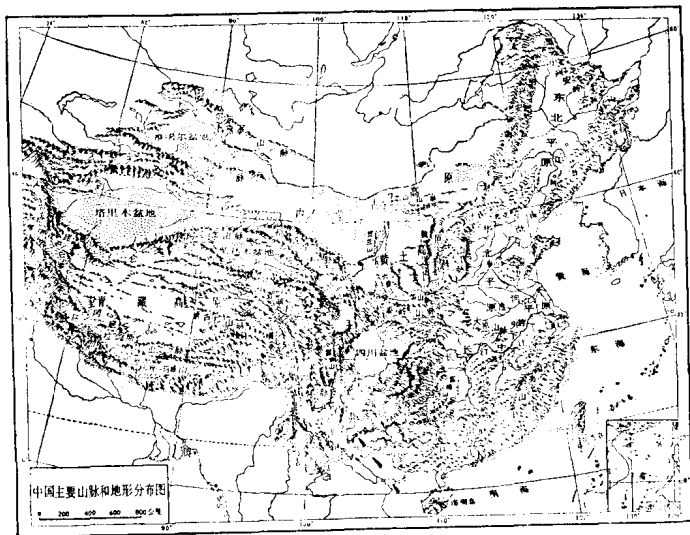
中国文明在这片土地上至今是在不断地发展还是走向衰落？

如果中国文明衰落了它能在这片土地上复兴吗？

中国的地理环境到底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探索的问题。

中国地理形势图



导 言

本书的目的，如副标题所指，是要考察“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即考察那些历史上就存在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的问题。既然是考察这类长期性问题，就要涉及历史，涉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

我们的视野将统摄自商朝至清末的历史，但又不是叙述历史，而是从复杂的历史中清理出问题，考察这些问题在各时代的共同性，然后进一步追寻它们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从而判断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

例如，我们考察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特别注意它们与历史统一性的关系，是否具有各时代的共同性特征，如果具有共同性特征，那么中国历史的统一个性是什么？如果它们不具有共同性特征，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中我们将寻找中国历史的品性或个性以及由历史品性或个性决定着的中国的前景。

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首先从中国历史形成与发展的地理条件这个在历史中具有长时期不变性的重要因素入手，采取“还原历史”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地理生存环境对于中国历史品质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所谓还原历史的方法，即是不断退回历史中去思考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回顾，不是简单地从现实回到历史的某一个时代，例如不是简单地从现实中国回到清朝时代的中国，或

者再远一点，回到明代、唐代、周代的中国去，用这些朝代来简单地代表中国历史。

我们的还原历史的方法，即是找出影响历史的各时代的那些基本的原因（它们通常都是具体的、各具历史个性化的原因），而后在此基础上统摄历史。统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的统一性来看待各时代。

在我们的观点看来，历史是由一些决定着历史品性的具体因素造成的统一整体；每一个时代虽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每一个时代都只是那个历史整体的特定时代表现。即使这个时代特别辉煌，也只有在统一的、整体的历史中才具有意义。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视各时代的历史，相反，统一的、整体的历史，就是要从历史的各时代中找到各时代的历史的统一性，特别是要找到产生这种统一性的原因。但统一的、整体的历史，决不是各种简单事实的总合。例如，决不是纷繁复杂的具体事件、生活内容等等的总合。因为在这些事件、生活内容等等具体事情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各时代形式上的共同性，但它们并不是历史的本质上的共同性。在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唐朝、宋朝、清朝等等时代的形式上的共同性；甚至于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相近时代的形式上的共同性，但它们都不是历史的共同性。我们理解的统一的、整体的历史共同性，是指各时代是否具有同一种文化品质和历史特征的那种共同性。

关于统一的、整体的历史与各时代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还原历史方面给予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现实问题并不是现实的这个时代本身的问题，而是历史所具有的性质必然产生的问题。例如当代欧洲各国问题，英法、德法、法意及西班牙与法国、英国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哈布斯堡王朝时代，还可以追溯

到古罗马时代^①；又如东西欧关系，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东正教分裂时代，还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东西方民族形成的时代^②。但是，是哪一个时代产生了这些问题谁也不能武断地确定，因为单就那一个时代的问题，决不能成为恒久的历史问题。我们只能说，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整个历史的性质决定的。

但是，历史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只能说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族或国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同，因此它们的历史的性质也不同。为什么它们的历史性质不相同呢？我们只能说是因为它们进入历史的起点不同。为什么历史的起点不同呢？我们只能说它们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具体条件不同。进行历史创造活动的哪些条件不同呢？我们只能说最少它们在进入历史、创造文明时的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不同。为什么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不同历史和文明的性质就不相同呢？因为历史的本质就产生于诸民族与生存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存关系。文明不过是这种生存关系在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表现。

不同的环境中形成的文明各不相同，这大体是诸民族文明历史的事实。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古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各不相同，这是不需要过多证明就非常明显的事情。不同的文明所经历的历史道路各不相同，因此它们在历史中形成的品质也各不相同。即使文明在形式上看起来有很多相同的东西，但它们的品质是不同的。例如诸民族的历史中，国家形式、制度、物质生活、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可能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诸民族的文化品质都具有自己的独立个性，不能说全人类就是同一的文化，走着同一的

① 英、法、德、意、西班牙都是哈布斯堡王朝解体后分离出来的独立国家。

② 欧洲原教分裂以后，西欧各国信仰基督教，东欧各国和俄罗斯信仰东正教。宗教问题曾使东西欧及俄罗斯之间产生长期的政治、军事冲突，这种冲突对今天的东西欧及俄罗斯关系仍有影响。

历史道路。自从人类分化成不同民族,在各个不同地区走向文明以来,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清楚地意识到当代世界各民族或国家之间文明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也是造成当代世界很多重大问题分歧的根本原因。可以肯定,这些差别在过去决定着世界历史的性质,在今天仍然决定着世界历史的性质。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工业化社会会使世界诸民族走向历史“同一”,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工业化社会本身并没有脱离各民族过去数千年的文明史;工业化社会也具有各民族自身文化上的特点。特别在工业化方式,工业的组织、管理、运作方式,甚至产品设计及其美化方面,都具有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如果说仅就工业社会的形式统一,例如以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有工业或以其工业规模的大小、工业的功能、人们生活与工业的关系等方面来看待历史的同一性,那么工业化以前的那个普遍的农业时代更具有同一性。但是我们都知,正是在这个普遍的农业时代,世界诸民族才具有了最明显的文化的差别。

那么,产生诸文明历史差别的环境差别是什么样的差别呢?对于诸民族的文明性质和所经历的历史道路而言,最直接、最基本的就是他们进入历史的地理生存环境的差别:包括某个特定地理区域的地表、地下、空间的生存资源,地貌形势,特殊的气候条件等事物组成的生存环境的差别,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诸民族历史发生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差别。生存环境的不同是诸文明在历史之初形态各不相同的原因。沿着这些各不相同的初期形态发展,各民族走着自己的文明历史的道路,也在历史进程中加强自己文明的独立品质,从而产生当代文明的差别。

所以文明和文明的历史的性质与地理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特别是一种文明形态形成的初期,其性质总是和产生它的地理生存环境相一致,甚至于“同一”;在今后的历史中,一个处于发展状态的文明,是在加强它自己的初期形态的独立性质,而不是减弱它的初期形态的独立性质。

那么这个文明与地理生存环境的初期性质的形成到底是在哪一个时期呢?我们认为是一种文明或文化产生以后,形成自己的习俗、生存方式、艺术、宗教等等明显特征的那个历史的初期。古代史与历史考古学都证明,这个初期,诸民族文化的产生都与生存环境直接相联系。我们的观点只是要说明文明的初期品质对整个历史的影响及其地理生存环境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

如果说文明及其历史发展与地理生存环境无关,只是人类自己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恐怕只能把诸民族文明与历史道路的差别归结于生物性的种族差别的结果;或者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自由”创造的结果。但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说明,文明与历史的差别是由于种族差别所造成的;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活动,也无法说明精神创造活动的条件是什么。因此,我们认为诸民族历史的形成、发展、生存的第一条件,是它们的地理生存环境的条件。

由于上述理由,我们在考察中国历史的性质时,特别重视中国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生存条件对中国历史特殊性质的影响。但是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①。我们只是把地理生存环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条件来考察。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过程中,地理环境上的生存条件确实与中国历史的性质不可分割;我们可以在考察的过程中,确实地指出中国的历史现象、重大事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即使我们在说明地理环境的决定性时,也并非从地理原则的普遍性来说明必然性,我们只是指明中国的特殊生存条件与具体的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而非一般地认为地理决定着历史的性质。

因此本书的一个方面,着重于分析中国的地理环境中的生存

^① 地理决定论认为一个民族的品质、气质、文化甚至精神、心理等等都由地理因素决定。

条件对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影响。我们从中国的地理生存条件入手，找寻它与中国历史中的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之间的关系；分析地理条件与农业区域分布、农业发展模式之间的联系；找寻农业状况与农业结构对中国历史的特殊周期性动荡现象、帝国周期性兴衰交替的影响；从分析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找寻游牧民族对汉农耕民族入侵所造成的中国历史性质的变化；从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地理条件中，找寻历史上诸帝国经济、财政上的共同弱点以及这些几乎不可克服的弱点与社会政治的本质的联系；从黄河农业衰退的原因、游牧民族入主中国、宋以后的民族大融合中，找寻中国文明品质变化的原因；从地理形势、农业分布、土地肥力衰减规律、经济重心变化、可利用的地理生存条件减少等生存环境因素中，找寻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兴起、延续、存在的条件；从山地农业、山区农村社会发展与中国地理形势的关系中，找寻它们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从地理地貌结构与中国区域性、地域性社会结构中，找寻中央集权政治与各种地方主义、地方势力的关系；从中国历史上地理变化的原因与形式中，找寻它对中国历史发生的性质变化的影响。

总之，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历史与地理环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必须指出，我们并不打算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其他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去，但是对于中国，地理环境对于历史性质的影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反映出来的特别品质，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例如中国历史的周期性秩序动荡与中国的农业方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农业方式又与农业条件的地理分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于是历史的周期性秩序动荡与地理环境之间也存在着相应的联系。

又如，在分析中我们发现宋朝以后中国历史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这种转移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黄河流域的

旱地灌溉农业引起土地盐碱化。随着这种地理生存条件衰退造成人口与农业的重心转移变化,黄河文明的兴衰周期也随之到来;接着兴起的是长江文明的历史周期。因此,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性质的判断,特别是对于历史中国对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判断,不能采取完全的传统态度的观点,而应更重视长江文明的历史周期的性质变化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本书的第二方面在于寻找中国历史的内在线索。为了寻找历史的线索,我们以黄河文明的性质为基础,分析几个重大时代和朝代所具有的文化品质以及这些时代和朝代与黄河文明的关系,由此来判断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这一部分我们采取了与传统史学和传统历史研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传统史学的观点与方法,例如从二十五史和其他史料或考古材料整理出来的“通史”,多以时代为主要线索,以汉民族的历史为主流,以朝代的先后为史序,目的在于记录和叙述各朝代的重要事实与事件,体例不管怎样变化,多系编年史性质,并不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统一性的研究。

传统史学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例如对农民起义、王朝兴衰、商鞅变法或王安石变法等类现象的研究,或者对某个朝代的断代研究,多出于两种历史观。一种历史观来源于西方进化论观点,这种历史观认为全人类走着同一条历史的进化发展道路,其中近代西方的发展代表了这种历史进化发展的最先进水平,因此诸民族或早或迟都必然要经历西方的历史道路。这种历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即是在中国历史的各时代或朝代中寻找与西方历史相近似的那些时代的共同特征,以此来证明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最终目的,是要说明中国文明走向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必然性。

另一种历史观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

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重视全人类同一的历史,认为世界诸民族都必然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达到世界同一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即是在中国历史的各时代中寻找历史唯物主义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他们对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是在历史现象中寻找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据。整个中国历史,即变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史。

两种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解释,虽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都忽视了中国历史与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实际上这两种历史观都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先进”论的文化观点的产物。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重视从中国自身的文化系统来解释历史,但他们又多受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往往产生儒学的偏激。由于这种偏激,传统历史观不够重视客观条件对于历史的影响。

我们采取的历史观点,首先是从中国文化系统来看待历史;从中国历史自身来认识中国历史。我们非常重视中国文明的性质和中国历史的独立、特殊的品质;重视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中不同于西方和其他民族或国家的那些品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的个性,不赞成对中国历史进行那种全人类同一的历史观的解释。我们从中国历史的事实出发,对中国各时代和朝代的文化性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搞清各时代或朝代与中国历史统一性的关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文明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中国历史已历时五千年,但中国历史的性质受到中国的一些特殊的具体事物的影响,并不是一以贯之,保持着同一方向发展的。但必须说明,这种变化并不是所谓世界诸民族共同的历史规律产生的,而是由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造成的。

根据这些具体的事实,我们大体可以对中国历史的时代性质

作出判断。在我们看来,自黄河文明产生到夏商朝到唐朝这段时期的历史,大体可以称为中国“古典形态”的历史。这个大时代的历史,完成了整个黄河华夏文化到汉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形态的发展。到唐朝时期,黄河文明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峰。唐朝以后,黄河文明的历史形态发生了变化,开始走向衰落。这次衰落一直延续到清代,它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变化。

在黄河文明的大时代,有两个决定历史性质的重要朝代:一个是周朝,一个是汉朝。周朝代表了黄河文明“原本”的品性(请不要把“原本”理解成“原始”。我们认为即使是原始一词,也只表示时间久远的概念,并不表示“简单”或“粗浅”。事实上对于文明形态而言,文明的很多基本品质在“原始”时代即确定了,它甚至贯穿文明的全部历史),因此周朝表示了中国历史的一种品质;汉朝则代表了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品质。事实上汉朝开创了汉文明的历史,它确定了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形态。汉朝以后的各朝,都是汉朝历史形态的复制,某种程度上都只是汉朝文化品质的再现,只是朝代的名称不同而已。因此,汉朝是一种“文明形态”的代表,汉以后的各朝,更多地代表一种“政治形式”的名称,它们的历史品质更接近于汉朝,而不是周朝。

中国从夏商到唐朝这个时代的历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形态的历史有一定的相似性,大体都可以称为“古典形态”的历史(当然这种相似性是指历史过程的相似性,不是指文明形态的共同性)。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古典形态的历史都产生了衰亡,走向古典的终结,留下的是它们改变了形态的后代。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在原来的空间上结束了它们的历史;古希腊罗马文明在欧洲大陆上改变成欧洲文明,得以延续其历史;黄河文明转移到长江流域以后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造成古典时代历史终结的原因,历史学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据我们的观点看来,主要原因是“文明形式与生存环境相互适

应”方面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

所有古典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文明形式与相对狭小的生存环境条件之间“紧密”的相互适应性。当一种文明形式与生存环境不相适应时，文明只有改变它的形式去适应生存环境，或者向外转移去获得与文明相适应的生存环境。如果两者都不能实现，文明则失去了它的生存条件而走向衰亡。

但是，古典文明反映出来的那种文明形式与狭小生存环境之间的紧密性或一致性，往往使它难以改变形式或扩张去适应环境。因此，一些没有改变和扩张能力的文明便走向衰落。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观点是生物对环境适应的观点。其实，文明与人类历史本来就不能脱离“人”这个活生生的“生物”。生物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特点简单地适应生存环境；而人则以他们创造的文明来适应生存环境。文明，不管它具有多复杂的形式，或者取得多伟大的成就，本来就是生存环境的产物。正因为这一点，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文明才具有不同的品质；历史不过是去保持和发展这种独具个性的品质。

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国历史，有利于我们搞清楚中国历史自身的个性与发展线索，分析各个时代或朝代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地位，以及搞清楚它们对历史统一性的影响，从而判断当代中国的历史性质与未来方向。

例如，当我们确定了中国历史的那个古老时期的大时代的性质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分析判断秦、汉、唐等统一帝国各朝的具体的文化品质，以及这些朝代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意义；当我们对唐以后的中国历史的性质与变化作出具体分析判断以后，我们即可以比较清楚地对宋、元、明、清等大朝代的品质以及它们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的意义作出分析判断。当我们搞清楚了中国历史的个性品质与总线索以及影响历史发展的那些长期性的问题以后，我们才有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性质作出判断和展望前景的根

据。

显然,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涉及的是如此宏大的历史领域,要想逐一厘清发生在如此大的历史时间尺度的诸多问题是不可能的,这除了笔者的学力不够以外就是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因此,我们的基本方法即是“问题史”的方法,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来谈论历史。

责任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谢啸冰



童中心，1949年生，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研究生毕业，现于贵州民族学院社会学系任教。

主要致力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喜游历，曾游历中国大部分省区，于游历史映证历史。有历史学、文化学论文20余篇发表。